

(上接第6版)

5月30日上午,由上海总工会、学联、妇联等发起的“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各界人士共计1000余个团体6万多人冲破敌人重重阻拦赴会。会场旗帜如林,挽联满台,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工人纠察队员手拉手,筑起一道人墙,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由学联的张超主持,全国学生总会李硕勋宣读大会宣言和通电,表示要“继续诸烈士未竟之功,以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会上,工商学各界代表纷纷演讲,表达反帝的决心。会后,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下午2时许,3000名小沙渡工人在中共小沙渡部委书记郭伯和、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龙大道领导下,由西门大会会场冲进法租界民国路(今人民路)新桥街口向北进军,突破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口中印巡捕防守,越过英租界西行至小沙渡。当这支队伍行经至南京路时,前导者高举3丈高的一面大旗,全队则小旗招展,两旁群众见状顿时欢声雷动,掌声和欢呼声响作一片,电车交通也被迫停顿,群众在车上贴上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并将数辆电车击毁,一时公共租界上的公共交通几乎全部停顿。租界巡捕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面前不敢开枪,用警棍、水龙头驱赶群众。游行群众满怀着对帝国主义愤怒,以砖头、瓦块、木棍等作为武器与英捕、印捕搏斗,也有居民从楼上向巡捕扔石块、板凳。游行示威直到晚上7点钟才结束。

这一天,内外棉11个厂全体工人响应上海总工会号召,开始为期两天的罢工斗争。

在大规模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不断壮大,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到1926年5月时,工会会员达到21万人。

三、1926年日商纱厂工人两次罢工斗争

如火如荼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给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的鼓舞,激励他们奋起反抗工厂主的残酷压榨和苛待。而1926年五六月间,正值物价飞涨,6月份的米价从早先的10元1石涨到高达19元1石,纺织工人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于是纷纷起来抗争。在这轮罢工浪潮中,除闸北、虹口地区丝厂数万工人罢工斗争外,以内外棉四厂、五厂工人罢工斗争最具力量。他们在纺织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斗争。

6月24日,内外棉四厂工人为反对工头诬控工人毁坏机器并有放火行为而罢工;6月28日,内外棉三厂工人为援助四厂工人举行罢工。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军阀立即对工人进行了横蛮的迫害,有16名工人被捕,其中两人被判坐西牢3年,另有几人被判刑7年;内外棉四厂罢工工人唐某因讲演而被捕,内外棉三、四厂工人开会,大队巡捕赶来驱散,捕去5人,并向工人开枪。三、四厂工人罢工后,厂方立即以纱业不景气为由,将工厂停闭,之后,又在谈判中提出要几十名工人“自行告退”再考虑开厂的无理主张。后来更是提出了愈加荒谬的开厂条件:资方可任意开除、招添工人,罢工期内及其他一切津贴今后一概不发;被开除之工人一概不发给津贴;工人请假不得超过一个月等等。对此,工人立即予以坚决拒绝。7月7日,内外棉各厂工人罢工1小时,其中内外棉东西五厂则继续了1天,并提出启封总工会的要求。厂方因工人罢工意志坚决,不得不于7月7日派出代表与工人谈判,但经10次谈判仍没有结果。7月23日,经纱厂总工会会同三、

四两厂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厂方被迫接受了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用巡捕殴打和无故拘捕工人等3项条件。但工人方面也受了损失:工人被捕16人,被开除8人,罢工期内工资也不发给。7月24日,工人开始复工。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再次被军阀查封。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在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应极力争得上海工会的公开存在,并普遍宣传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上海党部尤须知道上海工人参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运动。”

8月4日,停泊在上海的日轮万里丸上的日本水手行凶,将小贩陈阿堂无故打死,事后,日本领事馆又将两名凶手秘密送回日本。此事引起了上海工人和各方面的强烈抗议,日商纱厂工人由于身受日人蹂躏,故对此尤感痛切。中共中央决定以陈阿堂惨案为导火线,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发动一次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以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步伐。

8月18日,上海全市日商纱厂工会联合发表宣言,称“我日厂全体工人,誓为陈阿堂复仇,并坚决反对东洋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自本日起,愿予日厂主以3日之考虑,各日厂主须于此限期内联名要求日领,引渡陈案凶犯,诚意解决工潮,否则吾全体工人,誓当站在一切民众之前线,作拼死之长期奋斗。”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要求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破坏日华纱厂工人筹备陈阿堂追悼会,并抓捕工人。帝国主义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工人们的不满。

8月20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的精神,决定采取从防守转入进攻的策略,组织特别委员会以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立三、项英等5人组成。同日,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大罢工命令,命令日商纱厂东西五厂、七、八、十二厂实行同盟罢工。当天下午2时许,小沙渡内外棉东西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十五厂工人7000多人,齐聚潭子湾,召开大会,决定一致罢工。会议通过了致中国官厅的函,指出:

去年五卅国耻,即导源于日厂惨杀工人顾正红,致激起全国国民之愤慨,争持数月,至今沉冤未白。乃日人毫不悔悟,又于八月三日,打死我同胞陈阿堂,全埠市民奋起抗争。日领仍无惩凶之意,稍具爱国心,莫不引为奇耻。

函件提出了引渡凶手、改良工人待遇、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等要求。

此后纱厂总工会又连续发布多道命令。8月25日上午,内外棉十三、十四厂工人举行罢工。26日,九厂投入罢工。27日,同兴纱厂也参与罢工,总罢工人数达2万余人。

8月26日,上海总工会下令全市日厂工人迅速作好对日总罢工的准备,待命行动,并通告中、英各厂工会,在此期间,不要轻易发动罢工,应集中力量一致对日,捐款救济日厂罢工工友。此后,上海各日厂工会都开始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通电、告市民书等,揭露日本

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罢工工人。

日本在华纺织业公会总裁船津辰一郎立即赶往南京,与军阀孙传芳密谈。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一致步伐,严厉镇压罢工。他们一方面侦察四出,拘捕工人骨干;一方面雇用大批流氓打手,强迫工人上工。大多数工人不为所动,坚持斗争。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配备斧头、铁尺等在工厂附近巡逻,对付破坏罢工的工贼流氓,双方时起冲突。

从8月26日起,学联发动学生在租界各处演讲,声援反日罢工。军警驱赶学生,学生仍坚持不懈。28日下午,上总、学联等组织的演讲队,在南京路一带又举行演讲宣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日厂罢工”等口号。爱国市民纷纷围观,人群拥挤,电车不通。外文报纸惊呼:“南京路又发生与五卅相似之扰乱”。租界当局出动铁甲车、消防车、机关枪队及大批巡捕前来弹压,逮捕示威群众数十人。同时,军阀当局下令通缉上总负责人,查封纱厂总工会,严禁一切集会。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打压,上海总工会和小沙渡罢工委员会于9月2日发表第三次宣言,鼓励工人坚持斗争。9月7日,上海总工会联合学联和妇联等团体发动了“九七”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签订25周年)示威活动。

这天上午,1万多工人、学生聚集在西门,准备参加纪念大会,但军阀派了3000多士兵在西门方斜路一带设防,严禁群众进入公共体育场,场内也满驻军警,将铁栅门关闭。群众只得改变方式,沿民国路结队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军警前堵后追,阻拦群众游行。群众一边与军警搏斗,一边行进。最后,在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桥路中集合,召开大会,通过告全国民众书,抗议陈阿堂惨案,声援日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祝贺北伐军战胜军阀吴佩孚等电文。随后,工人们分头进入公共租界南京路等处演讲,共有200多队,每队五六人不等,大多为纱厂罢工女工。演讲队散发大量传单,不断呼喊反帝口号,市民拥挤于马路两旁,情绪极为激昂,直到捕房派出大批马队和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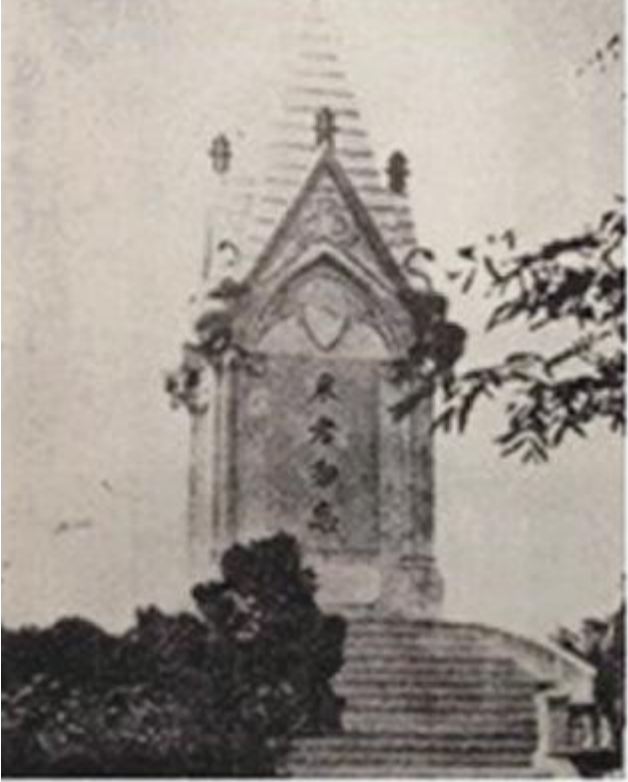


1925年12月30日,《向导》刊文悼念刘华烈士

甲车前来冲击,演讲队和群众才陆续散去。

这次反日大罢工中,上海总工会、学联等虽多次呼吁,要求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经济绝交,至少是采取抵制日货的行动,联合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积极。除部分爱国学生的支援外,日商纱厂罢工工人陷于势孤力单、难以为继的地步。加之当时纱市疲弱,日本厂主以停工关厂相威胁,致使局势对工人极为不利。9月中旬,罢委会主动转变策略,将斗争转向经济要求。但日本厂主态度强硬,企图用武力胁迫工人。最后经总商会调解,工会与厂方多次商谈,商定条件,于9月14日签署协议,并于16日宣布复工。

五卅运动后一年多时间里,上海纺织工人经历了多次政治、经济斗争和罢工,队伍逐渐地成熟起来,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严密了,这就为紧接而来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好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



位于闸北方家木桥的五卅烈士纪念碑亭。碑正面镌刻“来者勿忘”四个大字,碑侧镌刻蔡元培撰文、谭延闿书写的碑文。



五卅殉难烈士墓碑碑文